

谢世诚 著

愿天再生几个好人，
补偏救弊，何必苦限此虫氓！



罗泽南
Luo Zhenan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罗泽南

谢世诚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6N1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泽南/谢世诚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8740-5

I. ①罗… II. ①谢… III. ①罗泽南(1807—1856) — 传记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2666号

罗泽南 LUO ZENAN

谢世诚 著

责任编辑	郑若萍
特邀编辑	唐玉兵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740-5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来新国 王文成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周晓亮

编 委：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
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乌 琛

目 录

前言 / 001

第1章 风雨如磐暗故园 / 003

一、日之将夕，悲风骤至 / 004

二、强心针与手术刀 / 011

第2章 湘乡苦书生，长沙好秀才 / 014

一、生于末世运偏消 / 014

二、理学后起之秀 / 016

第3章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罗泽南的理学、经世致用思想 / 024

一、宇宙观 / 026

二、性理观 / 032

三、伦理—政治观 / 034

四、辩证法思想 / 058

五、经世致用思想 / 060

第4章 湘军中坚 / 066

一、参与创建湘军 / 066

二、凝固剂与稳定器 / 072

第5章 “罗忠节” / 077

一、攻占武汉 / 077

二、顺流而下，进窥九江 / 082

三、坚城难下，东奔西突 / 090

四、回攻武汉 / 105

五、终成“忠节” / 138

结语 / 149

附录

年谱 / 151

主要著作 / 154

前 言

罗泽南（嘉庆十二年至咸丰六年，1808~1856），字仲岳，号罗山，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亦耕亦读的贫民家庭。他的一生以咸丰二年（1852）为界，前后主要做了两件事：

罗泽南首先是一位理学家。咸丰二年以前，罗泽南精研理学及经世之学，确立了对理学的信仰，终身奉为圭臬。他写了许多著作和文章，在阐发理学著作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并讲学乡里，培养了一大批门生弟子。罗泽南的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程朱理学和经世致用思潮发展变化的情况。

咸丰二年以后，罗泽南投笔从戎，与太平军作战，对湘军的创建和发展起过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成为湘军中少有的独当一面的大将，参与制定了多项事关全局的战略决策，指挥过多场重大战役，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得以秀才的科举功名，战死疆场后被清廷特谥“忠节”。

然而，罗泽南更是湘军著名的“儒将”。据记载，曾国藩

死后，一个叫谢维藩的人在挽联中曾这样评价湘军的著名人物：“吾楚多武功：新宁伟节，罗山邃学，益阳雄略，湘阴衡阳皆卓荦勋名，相度恢然众贤汇。”可见，在时人心目里，同是儒生出身与太平军作战的人，与江忠源（新宁人）、胡林翼（益阳人）、左宗棠（湘阴人）、彭玉麟（衡阳人）相比，罗泽南是以“邃学”亦即精进程朱理学和经世之学为显著特色的。确实，罗泽南在湘军将领中学究气味最浓，他不仅有系统的理学著作，始终笃信理学，而且在戎马倥偬中仍钻研理学不歇，著述不停，更重要地，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他是以其理学、经世之学思想作为指导的。没有他 1852 年以前的理学、经世之学的思想，就不会有他 1852 年以后的实践。正如曾国藩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中所说：“咸丰四五年间，公以诸生提兵破贼，屡建大勋，朝野仰叹，以为名将。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于学者久矣。”

因此，剖析罗泽南的思想及其实践，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就让我们来鸟瞰一番这位“罗忠节公”吧。

第 1 章

风雨如磐暗故园

湘江跃出广西灵川的海洋山后，穿灵渠，挟潇水，入洞庭，一路北上，涛声万古，滋润着富饶美丽的潇湘大地。她所哺育的三湘儿女，生生不息，代有人杰。清朝嘉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08 年 1 月 19 日），我们的传主即诞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爱湾洲的善庆乡新林里一户罗姓人家。家人为他取名泽南，字仲岳。新林里地处罗山之麓。罗山山峦秀丽，清泉甘冽，“群峰钩连，四面罗列，故名曰罗山”。罗泽南从小即对此山十分钟爱，因而长大后又自号“罗山”。他还有一字叫培源，三十岁时，他又改号“悔泉”，不过这一字、这一号并不流传，人们仍喜欢称他“罗仲岳”“罗罗山”。

罗氏先祖世居江西。元朝时，其族中有叫华十三郎的由吉水迁徙至湖南衡州，随后他的儿子又迁至新林里，这一支子孙遂世居此地。罗泽南的曾祖父是罗日阮，曾祖母萧氏；祖父是罗拱诗，字六艺，祖母贺氏；父亲是罗嘉旦，母萧氏。罗泽南排行第二，上有兄长罗清漪，早卒；一个弟弟叫罗泽曙，但远

不如他有名。还有姐妹三人，她们与所嫁的丈夫，皆平常无闻。

一、日之将夕，悲风骤至

罗泽南出生至成长时期，正处在清王朝由盛转衰之际。

乾隆以降，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王朝，已经经历了鼎盛时期而无可挽回地开始走向全面衰败：政治日趋腐败，经济不断恶化，阶级矛盾步步尖锐。以嘉庆元年（1796）发生的川楚白莲教起义为起点，各种社会动乱连绵不断，其景况正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龚自珍在《尊隐》和《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中所形容的那样：“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履霜之脬，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癆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正虎视眈眈，伺机东侵，力图打开中国这一东方最大的市场。罗泽南出生时，英国等国的鸦片走私已步步深入。道光二十年（1840）罗泽南三十四岁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爆发，清王朝遭到惨败，随后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湖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鸦片战争前后，同样避免不了逐步衰微的命运，但又有其许多特点。

湖南地处中南，与川、鄂、粤、桂、赣诸省犬牙交错，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鸦片集散地。道光十八年（1838），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辖境内厉行禁烟，仅半年时间即在湖

南查获烟贩十余起，收缴烟具两千余件，以后又不断破获境内走私鸦片大案多件。鸦片战争中，湖南虽非前线，但也是受害深重的省份之一，影响遍及穷乡僻壤。及至鸦片战争以后，鸦片弛禁，鸦片贸易合法化，毒品遂得以更加迅猛地进入湖南，白银外流加剧，钱贱银贵的矛盾更加突出。财力只相当于江苏、浙江一个大县的湖南此时分担了巨额赔款，最终加重的只是人民的负担。清政府除搜刮聚敛外，蔑视民生，以致湖南连年水旱频仍，风灾、虫灾迭现，实乃民不聊生。

更引人注目的是，此时湖南的吏治腐败更加严重。

清代的吏治，一直存在着官员贪污、官员“疲玩”（腐化堕落、旷误公事）和胥吏违法三大顽症。这三大顽症此时在湖南的表现相当突出。看看当时官方记载的一些情况，实令人触目惊心：

道光初年，湖南署攸县知县叶起鹏征收农业税时，竟然私定每石大米折价五六千文，超过每石二千文左右的正常价格的二三倍。这种差价，就落入了叶起鹏的口袋。

许多官员不仅贪财，而且好色。湖南湘潭县知县灵秀在署理龙阳县知县时，看中了捕役周顺的女儿。尽管此女已嫁给傅元，灵秀竟威逼周顺将她卖给自己为妾。为掩人耳目，灵秀又令周顺诡称是将该女改嫁给王姓，并给傅元钱十八千文，逼其写下契纸。后因事情败露，丑声四布，灵秀又将该女转送给一个叫王国磐的为妻，仍付给原买契纸，想令王国磐充当他伪造的原买主王姓，以掩饰其丑行，实属无耻之尤。

布政使是清代一省的最高民政、财政长官。而湖南布政使

惠丰自升任此职后，养尊处优，对吏治民生一概不管，一切公事无不废弛，成天忙于修建亭台楼阁、水池花园，宴飨宾朋，养畜鸟兽宠物。衙署中有一只取名叫“洋八哥”的鸟，经惠丰精心饲养，长得油光水滑，能说会道，每当宴客时，惠丰总要作为保留节目取出“洋八哥”表演一番，甚至酣嬉终日，如醉如痴，以致民间称之为“惠顽”——既说其“会玩”，又讽刺其冥玩不灵。

与精于贪污、渔色、玩乐相比，官员们对待公事就大为马虎了。如湖南桃源县知县张梦蛟在审理民妇何潘氏身死一案时，竟然忘记将供词记录上报。直至何潘氏的亲属赴京控诉，被递回审理后，张梦蛟才发现这一漏洞，于是急忙对原件倒填日期，补送上司，企图规避处分。

在清朝吏治腐败中，胥吏的违法乱纪是普通百姓最直接身受其害的一大问题，直至清朝灭亡也一直无法解决，号称与清政府“共天下”。

胥吏由小吏和差役组成，本是清朝国家机器的一个环节，也是清政府实行统治的不可缺失的爪牙，但清政府却给予胥吏极其苛刻的经济和政治待遇，并将其大部分视为贱民，而导致胥吏集体前途无望，转而寡廉鲜耻，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

如包括湖南等有征运漕粮任务在内的各省，负责集中征收漕粮的胥吏，贪污的花样百出。胥吏先以贿赂从州县官手中谋取此职，得以承包该县漕粮征收，私征数目即由其决定。再与具体征收的漕书等勾结，上下其手，以完作欠，以少报多，真单与假单互淆，新赋与旧赋混牵，在一派混乱中浑水摸鱼，大

发其财。又有胥吏充当粮差，将乡僻小户的通知单——“易知单”扣住不发，勒令折价交兑，每米一石，往往勒索制钱七八千文。州县官收兑时，胥吏头役就在仓外巡逻，粮户交米，必须向其交足私费方被准许验米交兑，否则以米色不合格而拒收。粮户好容易得以赴仓交米，但收兑的胥吏大斛进，斛口开宽，额定五斗的一斛可至六斗以外。随后，胥吏又公然将每十袋漕米扣出一二袋，名曰“扣猪”，缺额则掺和粮粃秕谷以充数。

胥吏还擅长伪造文书印信牟利。道光四年（1824），湖南河溪辰州营书差王桃暹、镇筸营书差王桃桦等人，串通道书谢国铭，雇用朱三等人，私雕各营关防印信十三颗，冒领司道库米折、罚俸等项银两二万二百余两，硝磺五万九千余斤，行骗对象遍及永州、靖州、长安、绥宁各营，这是当时引起轰动的一件大案。

在刑事司法方面，胥吏牟财的一大特点是私设“班馆”即拘留所。道光十五年（1835），有人向道光帝揭露湖南宝庆府属邵阳县私设班馆的黑幕。据称该县有正式差役千余人，非正式的“白役”“散役”二千余人，头目有号称“窃盗阎罗关”的谢定，号称“四大寇”的周捷、萧斌、萧祥、李连，以及号称“十八路诸侯”的鲁宾等十八人。他们私立“卡房”，即班馆三所，一名“外班房”，一名“自新所”，一名“中公所”。往往有田土、婚姻等很寻常、细小的讼案，差役将原被告和人证传到后，一齐尽数押入外班房，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凌虐：拷打，私用镣铐束缚，甚至以长绳系其右手、右足大指，悬于空

际，取名为“钓半边猪”，迫使其交钱买命。胥吏勒索到了钱银后，当事人才被押入自新所，同样经过一番折磨，再被发入中公所，在此处又被索取“上灶”“摊襪”等费用，才被准许吃饭就寝。每年三卡内被折磨而死的在押者不可数计。凡是垂死之人，差役首先向主官投递该人生病的病状，借以推卸责任。更有讼家的仇人，重贿差役钱财，差役遂将被押者用“好汉架”“对面笑”“魁点斗”等酷刑凌磨致毙。

胥吏的为非作歹，又与主管官员的庇护分不开。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不正当的经济关系。胥吏竭力在经济上拉拢官员，往往将其朘削民财所得，主动予官分润。如御史金光杰曾揭露称，州县到任，有向各房、班书吏、差役收“点卯费”的陋规。房书即于点卯之日，先行缴入，各役则俟有差遣之事时陆续缴完。此外还有经承注案、差役买票等费用。又有新选之官甫经到省，书役等即先借钱给这些官员作活动、安家的费用。当案件发生时，遇有催查事件或传集案证，胥役即出资打点，指名求派，其费自数千至一二十千不等，此为“坐差费”，又称为“买票钱”。本官得钱后即将此事派给该役，此后无论案件进展如何、延续多久，皆不换人接办。该胥吏即凭此敲诈勒索，为所欲为，主官则不闻不问。这种状况在湖南也特别严重。

吏治的腐败，严重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湖南的动乱不断发生。

道光十一年（1831）十二月，湖南永州府江华县锦田乡长塘寨赵金龙率领瑶民五六百人起义，随后参加者近万人，并一

度攻占新田县城，杀死知县王鼎铭。清军先后出动万余人，以伤亡将官二十五人、士兵七百五十人的惨重代价才将起义平息。事后道光帝在上谕中曾说：“此次该逆滋事，虽讯无激变起衅别情，惟该逆先杀会匪及书差男妇多人，可见平时受奸民欺侮、蠹役吓逼结怨已深，不能因该逆业经谋反概置不问。”道光帝此话虽闪烁遮掩，但实际上是承认赵金龙起义是由吏治败坏所引发的。赵金龙起义前，制办旗帜，铸造枪炮，当地的官员对此竟然毫无觉察，甚至对赵金龙出入用旗帜护卫这种明显的越轨行为也一无所知，数百人几乎是在官员眼皮底下完成了起义准备而无人过问，实乃滑天下大稽之事，当地官员的颓废状况，实在令人吃惊。当地原有专任官“理瑶同知”，自嘉庆十九年（1814）设置以来，不少任职者皆尸位素餐，从不“理事”，不是谋得差事远出，即是钻营得以留省办公，鲜有莅任者。如当时的现任理瑶同知王立名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选授此职后，从不到涛墟本署“办公”，一直逗留省城，营求差委。理瑶同知衙门已衙署倾欹，吏役星散。当他听说赵金龙起义的消息后，即夤缘湖南巡抚将其调署长沙府通判，令其押运进京，以为脱罪。道光帝斥责这些地方官“平日苟且因循，养痍貽患”。从维护清政府统治的角度来说，这一指责一点也不过分。问题在于清朝官员的这种恶习已病入膏肓，时过境迁，不能有丝毫改进。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元年（1851）间，湖南自然灾害更加频仍，官吏倒行逆施有增无减，天灾人祸交相呼应，其结果是，湖南境内哀鸿遍野，动乱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842年1月22日），湖北崇

阳县已革生员钟人杰，因反抗胥吏勒索，与陈宝铭等聚众三千余人在湘鄂边界崇阳、通城一带起义，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1842年2月22日）一度攻入湖南平江境内，重创清军。直至正月二十一日（3月2日）清军攻占崇阳，钟人杰等被俘杀，湘东北才得以暂时安宁。

道光二十三年五月（1843年6月），宝庆府武冈州监生曾如炷、贫民曾以得聚众阻米出境，并杀死知州徐光弼。

道光二十四年（1844），耒阳又发生了阳大鹏领导的群众抗钱漕积弊的斗争。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广西会党首领胡有禄潜入湖南，袭攻宁远县城。次年胡有禄又与朱洪贵攻入江华县境，杀把总黎景星、武生周承谟。同年，在东安、祁阳等地还有王宗献、魏洪培等利用宗教聚众起事、反抗征收钱粮的斗争。

道光二十七年（1847），乾州厅苗民因水旱虫灾导致粮食严重减产，起而反抗地主勒收租谷，发生了石观保、杨光明、杨长贵等领导的起义。正当清政府手忙脚乱穷于应付之际，九月十二日（1847年10月18日），雷再浩在新宁黄卜峒、滑溪等地发动了瑶民起义。直至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12月3日、4日），雷再浩和另一首领李博方先后被俘。然而，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1849年11月27），新宁又爆发了李沅发领导的更大规模的瑶民起义，攻占了新宁县城，至十一月二十九日（1850年1月11日）才主动撤出。随后起义部队转战湘桂边界，多次给予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直至道光三十年五月初六日（1850年6月15日）李沅发被俘，起义随后才被扑灭。

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事，既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在湖南的统治，大大削弱了清政府的力量，更是一种信号，预示着迅雷即发，山雨欲来，更大规模的动乱即将发生。

二、强心针与手术刀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发展，向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寻找有效方法来阻遏造反浪潮，维护清王朝统治。于是程朱理学亦即宋学（明朝对此有进一步强化和发展，故也称宋明理学）再次盛行起来，逐步超越了盛极一百多年的汉学亦即乾嘉考据之学，成了朝野士大夫的思想主流。

汉学之所以会被超越，走向式微，是因为它作为一种经院式的纯学术，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研究的对象是古典文献的文字音训，虽然取得了许多学术成果，但却不能提供完整的思想体系，更远远脱离实际，不能提供使政权长治久安的方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方面正是统治者巩固政权所需要的。

与此同时，经世致用的实学，也进一步得到广泛的流行。

儒学历来存在着“内圣”和“外王”两个层面。问题在于：程朱理学虽未放弃“外王”的目标，但其本质上则是一种伦理之学，强调的是自我修养，实际上淡化以至取代了经世致用。此时，封建思想家们也终于认识到，单纯提倡理学，对于封建统治的巩固虽有作用，但却是一帖慢剂。如梁启超在《中